

強化大學問責機制 擦亮香港高教金字招牌

香港八所資助大學（八大）與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早前共同簽署了2025-28三年期《大學問責協議》，《協議》除了明確特區政府對八大的財政支持，在保障院校自主性和學術自由的前提下，也進一步強化了大學的問責機制，提升良好管治，使大學表現符合國家、香港與社會期望，確保公帑用得其所，實屬合情合理且必要之舉。《協議》訂出六大策略方針，為院校發展指明方向，持續培養德才兼備、可堪大任的棟樑，更積極主動對接國家和香港的發展戰略，深化國際交往合作，將香港高等教育的金字招牌愈擦愈亮。

黎子珍

確保公帑用得其所 回應社會期望

特區政府透過教資會向八大在2025–28三個財政年度提供合共681億元的撥款資助，充分展現了特區政府即使在面對財政壓力下，依然支持大學高質量發展的毅力及決心。如此巨額公共資源投入，自然需要設有相應的問責機制來確保大學「每一蚊都用得合理合適」。

《協議》除了一如既往明確了大學在資金運用、學額管理、課程設置等方面的責任，也列明了調整撥款的條款，指出若特區政府及／或教資會認為，大學在管治或公帑撥款管理有重大缺失，未有履行《協議》規定的責任，違反香港法律等重大情況下，有權調整大學的撥款金額，調整方式包括退還已獲發款項，暫停、延遲、變更以至撤銷撥款。此外，《協議》規定，當大學對學額管理不善時，教資會有權向大學追回資助或扣減其他撥款。這些問責條款能夠有效確保公帑得到妥善運用，督促大學在保障教研品質的同時，也顧及將公帑效益最大化，在有限資源的情況下，於教學、研究及社會責任上取得成果，以回應社會期望。

去年10月，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北京會見香港理工大學校董會主席林大輝、校長滕錦光一行時指出，香港的大學有悠久歷史和光榮傳統，在國際社會享有盛譽，是國家高等教育的寶貴資源，是香港的重要優勢和核心競爭力。香港各大高校肩負着立德樹人的重大使命，包括校董會、校長在內的高校管治團隊，不僅需要有奉獻教育事業的崇高理想，還要有相互信任支持、善於團結合作的高尚品德，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共同把大學建設好、管理好、發展好，不斷擦亮香港高等教育「金字招牌」。

引入制度化措施 提升大學治理

面對複雜多變的全球競爭環境，在提升和完善大學管治方面，《協議》也將不少良好做法予以制度化。《協議》列明，大學校董會與高層管理人員應加強溝通以促進相互理解與尊重，從而在保持職責明確劃分的同時推動協作，若校董會與管理層就重大議題出現嚴重分歧而可能損害大學管治，雙方應基於角色尊重，以誠懇態度盡力解決，特區政府及教資會有權就涉及院校或高教界整體利益的事宜進行調查研究，院校及所有領導者應予全面配合。

這些舉措有助確保及協助大學管理層凝聚共識，持續提升管治水平，除了有助更好達成大學設下的教研目標、願景及使命、加強公共資源運用效率，促進大學長遠可持續發展，更可維持大學的公信力與聲譽，增強大學校內外各持份者的信心，不斷吸引更多全球學生來港升學，更多國際學者來港發展，從而提升香港院校的國際地位與形象，為貢獻國際專上教育樞

紐建設及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構建良性循環。

院校自主不受影響 世界排名顯著提升

良好的管治是大學健康發展的基石，《協議》將特區政府及教資會以公正、持平態度介入調解大學內部運作矛盾爭議的權力制度化，這僅屬極少數情況下才會發生的事情，並不表示大學從此失去自主權或學術自由。相反，《協議》嚴格遵循基本法第137條訂明「各類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並享有學術自由」，大學在學術及管理事務上享有的自主權依舊不變。

《協議》幫助大學在面臨重大分歧時凝聚共識、重回正軌、共謀發展，非但不會干擾大學正常運作，反而是為大學的良好管治、高效運行及學術自由的大門愈開愈大，打下堅實基礎。香港有5所大學長期保持在世界百強，今年多所院校更在不同世界大學排名中有顯著提升，便是最佳的例證。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建設國際教育樞紐

值得注意的是，《協議》定下的六大策略方針為大學的發展提供了清晰的路徑，不僅涵蓋了學術與科研，還強調了學生的全人發展和國際化視野，更是聚焦香港當前發展所需，有利於構建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環，為香港的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

《協議》列明大學應對接國家長遠發展策略，尤其是「科教興國」、國家五年規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和「一帶一路」倡議，以及致力遵循中央政府就香港未來給予的建議和指引，特別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個必須」和「四點希望」。這能夠推動院校的發展與國家及香港的發展方向步伐保持高度一致，在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把握龐大發展機遇，培育年輕愛國愛港專業人才，為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和服務國家所需作出貢獻。

香港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和多元化優勢是其核心競爭力之一，《協議》列明六大策略方針中，也特別強調建設國際專上教育樞紐的目標，鼓勵大學加強與內地和海外知名院校、機構合作，吸引更多不同國籍和背景的優秀人才來港學習和發展，例如善用增加非本地生比例等措施，並為本地學生提供更多本地及境外學習機會。相關要求，有利提升香港在全球高等教育的聲譽及競爭力，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教育樞紐的地位，推動香港在創新科技等領域的高質量發展，為「八大中心」建設注入人才、科技新動能。

這次《大學問責協議》的簽署，標誌着香港高等教育進入了一個更加規範化、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在國家大力支持和特區政府的持續推動下，香港院校將繼續成為培養未來領袖的搖籃和服務社會需求的基地，並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國家的發展貢獻更多力量。

規範資助邊界 築牢香港教育公平基石

鄧飛 立法會議員 教聯會副會長



香港特區政府修訂政府資助專上課程學額及資助申請資格的新措施，不僅是對公共資源分配機制的優化，更是對教育公平理念的踐行。這項政策以清晰的規則劃定資助邊界，既回應了社會對「考試移民」的憂慮，也為香港教育的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其正面意義體現在多個維度。

一、遏制投機行為，守護教育機會的公平底線。教育公平的核心，在於確保每個個體都能在同等規則下競爭有限的公共資源。此前，部分受養子女未實際居港，僅以自修生身份應考香港中文憑試，卻憑「本地學生」身份申請政府資助學額，這種「隔空佔位」的做法，本質上是對教育機會的投機性攫取。它不僅讓公帑投入脫離真實教育需求，更直接擠壓了長期在港就讀學生的升學空間，動搖了社會對教育體系公正性的信任。

新措施通過兩大調整直擊問題要害：一是對受養子女設立兩年居港要求，並以在港就讀證明或出入境紀錄（每年離港不超90天）作為證明依據，確保申請人真正融入香港教育環境；二是明確持有全職工作簽證或各類入境計劃簽證的人士不再具備資助資格，杜絕「借身份套利」的可能。這些規定不是設置壁壘，而是以「真實居留、真實參與」為標準，讓資助資源流向那些真正在港學習、生活的青年，還原教育競爭的純粹性。正如公屋、綜援等社會福利均有居港年期要求，教育資助的合理限制，正是對「權利與義務對等」原則的堅守。

二、優化資源配置，提升公共教育的投入效能。香港的政府資助學位是稀缺的公共資源，其背後是社會對人才培養的長期投資。這些資源的價值，不僅在於資助學生完成學業，更在於培育既了解香港、又具備國際視野的本地人才。若資助流向長期不在港的學生，不僅造成資源浪費，更偏離了公共教育的初衷——教育的意義從

來不只是知識傳授，更包括對本地社會的認知、對社區的情感連結。

新措施通過「居港要求」實現資源與需求的精準對接。兩年的在港生活，讓學生有機會參與本地課堂互動、體驗校園文化、投身社區實踐，在真實的社會環境中理解香港的發展脈搏。例如，香港高校的法律課程緊扣基本法實踐，社會工作課程關注基層服務需求，這些課程的實踐價值，只有在香港本地生活中才能充分顯現。與此同時，資源向「在地學習者」傾斜，也倒逼教育體系更貼近本地發展需求，形成「資助—學習—服務」的良性循環，讓每一份公帑都轉化為推動社會進步的人力資本。

三、借鑒國際經驗，平衡開放與規範的教育生態。作為國際教育中心，香港既要保持開放包容的姿態吸引全球人才，也要通過合理規則維護教育體系的穩定。新措施在這一點上展現了成熟的治理智慧：它借鑒了英國、新加坡等國的經驗——英格蘭要求本國公民居滿3年方可享受本地生學費，新加坡對永久居民與公民實行差異化收費，其核心邏輯都是「教育資助與在地參與度掛鉤」。與此同時，政策並未關閉門戶：不符合資助條件的學生仍可申請入讀，只需按實際成本支付學費，這既符合國際慣例，也保障了教育的開放性。

至於過渡安排的設置更體現政策溫度。2027/28學年僅要求一年居港期，給予家庭充足的調整時間，讓真正有意來港發展的學生能提前規劃。這種「剛性原則+柔性過渡」的設計，既能杜絕投機行為，又能持續吸引高質量人才，讓香港在維護教育公平的同時，鞏固國際教育中心的地位。

教育是香港的核心競爭力之一，而公平則是教育的生命線。此次資助學額修訂，通過清晰的規則劃定權利邊界，讓公共資源真正服務於教育本身。當每個青年都能在公平的環境中憑實力競爭，當公共投入真正轉化為本土人才的成長動力，香港的教育生態必將更加健康，為城市的長遠發展注入持久活力。

完善法治保障 香港營商優勢更顯著

嚴剛 立法會議員



在中央堅定不移的大力支持下，特區政府充分發揮「一國」之本下的「兩制」優勢，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依託堅實的法治基石、自由開放的經濟政策以及「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區位優勢，重安全、求發展，強化特區內聯外通的橋樑作用，持續鞏固作為全球公正、高效、自由經濟市場的核心地位，推動香港可持續高質量發展，並持續提升全球競爭力。

特區政府日前發布的《香港營商環境報告：一國兩制 獨特優勢》，以詳實數據和客觀事實昭示：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其法治傳統、自由開放市場、廉潔高效的治理、聯通全球的區位優勢以及背靠祖國的龐大力量，共同構成了其不可替代的核心競爭力。面對複雜多變、前景不明的國際局勢，特區管治團隊識變、應變、求變，勇於創新，敢於突破，主動對接國家發展規劃，全方位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推動特區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並在多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成果豐碩 受國際看好

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6月發表的《2025年世界競爭力年報》顯示，香港全球競爭力上升至全球第三。由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與發展利益的法治體系保障的公正透明的國際自由港的穩定發展，得到了國際資本市場的充分肯定與看重。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2025年世界投資報告》亦確認，香港2024年的外來直接投資流入金額增加2.6%至1,262億美元，高居全球第三位。本港上半年IPO市場共錄得42宗新股上市，集資額達港幣1,071億元，按年分別躍升40%及700%，位居全球首位。惠譽、標普及穆迪三家評級機構一致給予香港「穩定」的信用評級展望。截至2025年6月底，所有人才入境計劃合共收到近50萬宗申請，當中近33萬宗獲批，近22萬人已經到港。具有國際視野的全球頂尖人才，用實際行動為香港未來光明前景投下了信心票。

香港特區由治及興取得的發展成就，是特區政府堅持依法施政、以結果為目標、積極有為施政的結果。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也是自由營商環境的金字招牌，更是公正營商環境的定海神針。基本法明確保障了市民及投資者的財產權、契約自由等核心經濟權利，為自由市場運作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香港國安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實施，更加為本港資本市場的合法自由運作澄清了公正透明的法治空間。

基於「一國兩制」的香港社會經濟制度是吸引全球資本的強力磁石。自由港與簡單低稅制、資本自由流動、無外匯管制的聯繫匯率制度，為國際金融和投資活動提供了無與倫比的便利性和穩定性。在公平競爭的社會環境中，健全的競爭條例和符合國際市場運作慣例的監管框架，能夠確保市場對所有參與者開放透明公正。

深化內聯外通 開拓經貿前路

面對瞬息萬變的國際局勢，外部不確定性揮之不去，香港更要持續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優勢，以自身所長、服務國家所需，為香港經濟保持穩中向好注入強勁動能。內地作為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為香港可持續高質量發展創造了無限機遇。香港憑藉國際金融、專業服務、科技創新等優勢，一方面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特別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強大製造業形成「一條龍」完整產業鏈；另一方面，充分運用香港資本、法律、知識產權保護等先進服務業，加強與中東、東盟等新興市場進行深度合作、不僅擴大香港的發展空間，也為助力國家強國建設賦能。

作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香港擁有深度且多元化的資本市場、日臻完善的金融基建，擁有過萬億元人民幣存款、處理全球約75%離岸人民幣結算業務，為國際資本配置提供全方位服務，成為國際資本進軍內地市場、內地企業「出海」無可替代的「超級聯繫人」，香港投資創富理想地的地位更穩固。

展望未來，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向縱深推進，以及香港「南金融、北創科」發展格局的逐步形成，法治保障、高效運轉的香港自由市場經濟，必將進一步強化其內聯外通的橋樑作用，勇於創新，敢於突破，加快產業升級轉型，為海內外投資者創造更多更大機遇，為國家發展貢獻更強勁香港動力。

平衡宏觀數據與微觀感受 動態調整穩預期

湯鐸鐸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經濟學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隨着中國經濟運行的波動起伏，宏觀數據和微觀感受之間的「溫差」不時成為輿論熱點。宏觀數據是對微觀個體運行情況的抽象和綜合加總，反映國民經濟總體情況。微觀感受是不同經濟主體的主觀感受，反映經濟的局部特點和個別情況。宏觀數據與微觀感受有差異，是很正常的現象。尤其對中國這種超大體量的經濟體而言，城鄉差異、行業差異、區域差異，以及經濟波動較大時的冷熱不均，都會放大宏觀數據與微觀感受之間的「溫差」。而且，由於「損益表達偏差」的存在，即受損者發聲、得益者沉默，往往使得微觀感受的公共表達以負面情緒為主，經過有意無意的輿論發酵之後，就有可能惡化經濟預期，甚至造成對宏觀數據科學性和權威性的質疑。

轉換固有思維 融入高質量發展

對於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而言，至少還有兩方面的因素會促成和放大宏觀數據與微觀感受的「溫差」。一方面，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雖然已經從高速增長階段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但是企業和家庭一定程度上還存在高速增長的慣性和幻覺。對企業而言，高速增長階段的「賺錢錢」和「野蠻生長」仍歷歷在目，有些企業還不能適應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搞創新、抓質量、「拚內力」。尤其是目前低通脹環境下激烈價格競爭造成的所謂「內卷」，更是讓部分企業不適應。

對家庭而言，在快速工業化、城市化的高速增長階段，從農村進入城市，從農民成為市民，從在城市無立足之地到擁有住房和其他財富，整體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然而，在高質量發展階段，家庭的收入、財富和消費更多是從有到好的變化，相較於從無到有，其幸福感肯定會出現邊際遞減趨勢。因此，所謂宏觀數據與微觀感受之間的「溫差」，某種程度上也夾雜了高速增長階段後的適應問題。

另一方面，除了歷史縱向對比的因素，個體之間的橫向對比也會影響微觀感受。雖然從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差距不斷拉大的趨勢得到遏制，但是貧富差距總體仍處於較高水平。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經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收入和財富差距，疊加民生方面的其他問題，往往會形成比較突出的社會矛盾。於是，在節節攀升的經濟數據和重大的經濟成就公布之後，往往會出現「與我月薪三千元有什麼關係」之類的消極輿論。因此，所謂宏觀數據與微觀感受之間的「溫差」，某種程度上還夾雜了對貧富差距的調侃和抱怨。

以實際措施 提升民生獲得感

總體而言，宏觀數據與微觀感受之間的「溫差」是客觀存在的，其形成有很複雜的背景和原因，會對經濟預期造成重大影響，需要給予充分重視。2023年7月，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表示，要正確認識這種「溫差」，指出這是由宏觀數據的綜合性和微觀感受的局部性決定的。在2023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注意把握和處理好速度與質量、宏觀數據與微觀感受、發展經濟與改善民生、發展與安全的關係，不斷鞏固和增強經濟回升向好勢頭。」

穩預期是擴大內需的重要途徑，把握和處理好宏觀數據與微觀感受之間關係是穩預期的重要方面，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一是要做好輿論引導，客觀報道中國經濟在各個領域取得的進步和成就，尤其是科技創新和新質生產力發展取得的最新成果。二是持續加大民生領域投入，對低收入群體進行兜底和補償，大力提升其獲得感，將亮麗經濟數據、重大經濟成就和廣大底層民眾的幸福感高度統一起來。三是出台縮小貧富差距的有力舉措，推動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四是積極維護、努力提升統計數據的科學性和權威性，將增強統計部門的公信力作為經濟工作的重要任務。